

在今年春节的前夕,上海《解放日报》的沈扬打电话给我说,我的老朋友《文汇报》《笔会》原主编开垒半夜哮喘病发经抢救无效已不幸去世了。我简直不能相信,还是一个多月前,我打电话给他,家里无人接听。我给沈扬打电话,才知道他因病住院。在十二月底,我收到了他寄给我的贺年卡,他还是那样认真仔细,卡内祝贺我新年的话以及他的签名和双方地址都写得清清楚楚,一字不拘,发信时间是十二月二十六日。我收到后非常高兴,以为他已痊愈出院了,急忙打电话给他,家中又无人接听,我想他可能住到女儿家里去了。万万没有想到,

这是他给我的最后一张贺年卡了。我与开垒相识于1943年中,至今已近七十年了。那时,在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当夜占领早已沦为“孤岛”的上海租界,整个上海正处于天寒地冻万物萧索的时期。我进大学不久,由于爱好文学,常在课余练习写些散文。但当时文坛上一片寂寞,除了日伪一些报刊外,只有很少几份综合性、趣味性的刊物。我选了两篇散文投寄给《万象》月刊,结果如石沉大海,没有消息。可是过了几个月,我接到作家柯灵的一封信,说他已编这份刊物,在

存稿中看到我的这两篇稿件,均准备采用,而且说如果我有空,欢迎我到编辑部去见见面。柯灵接编后,对刊物做了较大的改革,除了请一些蛰居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老作家化名写稿外,大量采用青年作者的作品。我常到编辑部去,认识了不少同我一样的在刊物上投稿的文艺青年,开垒就是其中之一。当时环境十分险恶,柯灵老师时常告诫我们说,年轻的作者要洁身自好,不要向日伪报刊乱投稿。写好的稿子可以放起来,等将来有机会时再发表,万万不能着急。对柯灵的告诫,开垒也是严格遵守的一个。后来,日本宪

最后的贺年卡

王殊

朋友送我一个木珠手串,紫酱黑色,沉甸甸的,还未接手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迷香,清雅朴素中透出的是甜。这种香气似乎飘散着

我就对他说:“我这个人是无神论者,不适宜戴的。”

联想到现在有的人手戴佛珠,而口里尽是不洁之词,也不怕玷污了佛祖……

朋友对我说:“这是串沉香珠子。具有行气止痛、温中止呕、纳气平喘的药理功效,它不仅能够去除秽气,还能够静心定神。你呢也不必那么较真,就你看不惯的东西多,一个开放的国度,应该有一个包容大气的环境,现今已不是一片红和一片蓝的那个年代了,有些个性的东西不也挺丰富和热闹

沉香

薄毅

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是我在中学物理课上就开始听到的名字。他亲自作了史无前例的自由落体运动的实验,发现了不同质量的物体下落速度并无两样;他通过教堂吊灯的摆动发现了摆的运动规律,即事物摆动周期的长短,只与绳子长度有关,而与其末端的物体重量无关;他创制了世上首架天文望远镜,用它观测天体,发现月球表面凹凸不平,由此绘制了第一幅月面图;他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,为哥白尼的日心学说找到了确凿证据,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。他被称为“近代科学之父”,评语是:“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,伽利略发现了新宇宙”。

伽利略成了我心中的偶像。去年九月,我有机会到欧洲去了一次,亲临他的故乡,开始寻找起伽利略的踪迹。说是踪迹,因为我了解的仅是浮在表面的某种迹象。而走马观花式的行程,获得印象也仅达到“丝丝”程度。

寻找到的踪迹之一,是伽利略做实验的比萨斜塔。55米高的钟楼建成后即始倾斜,被人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。我挤在摩肩接踵人群中,想象着这里原来是个村庄,住在附近的伽利略有机会经常登上钟楼,下面有多人围观,实验结果出来,众人欢呼不休!八百多年过去了,意大利人似乎并不把这作为一个卖点,现场少有专门介绍。一个又一个游客在斜塔下摆出用双手撑住倾斜不到4度(修正后)之斜塔的Pose,一副自以为创意十足的神态。伽利略如知来者置他的科学功绩于不顾,只把兴致放在扶斜塔之不倒的话,他一定会在圣十字教堂内大呼“对牛弹琴”也!

圣十字教堂有埋葬伽利略的墓地,我按“先贤祠”图示,急急找到他的墓碑。墓主体是他的一尊半身塑像,只见他右手握一望远镜,左手按一放在书本上的圆球。塑像下方是一铜质的地球等星球围绕太阳转的图案,头颅略仰,望着远方。塑像左右各站一人,右者双手持一纸质天文图,应是他首绘的月面图;左者手托腮部,向上凝视,作思索状。整个墓碑设计,涵盖了他的一生成就。下置一花岗岩大理石底座,再下则是一块汉白玉石板,用意文写着伽利略的名字和事迹简解。我在墓碑前留影,对这位敢于挑战权威、坚持实践第一、勇闯科学禁区的科学伟人,肃然起敬!那是一个成果斐然、大师辈出的时代!是一个教规无法压制、禁锢难以奏效的时代!这样的人和事令人向往,现已难以觅见,对照伽利略的横空出世,我们尚缺少些什么呢?



寻找伽利略踪迹

顾云卿

吗?拿着吧,玩玩。再说,这也不是上等的沉香,那些太贵,我也送不起,但我觉得这珠子可以平心静气,对你怡情养性很有好处。”

见朋友言辞恳切,怯于情面,只好收了手串,回家便往衣柜里一放,也就算是了事。

数月后偶然打开衣柜取衣,一股香气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,紫紫缭绕的就像原始森林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原木芬芳,循香而去,竟是丢在衣柜角落被早已淡忘的那串木珠,不禁感叹,那么小小的一串珠子居然有如此远非凡香可及的清雅之气,看来真还有点学问了。

于是抽空查研了一下沉香。因其种类较多,一时难以解全。只粗浅溯源得知,原来沉香是瑞香科植物的树干被真菌侵入寄生,发生变化,经多年沉积形成的香脂,由于油脂的比重较原木大,比重大的沉香投入水中便会沉底,比重稍大的会半沉于水中,再次之则不沉于水。故现今人们统称之为沉香。

得其出处,不禁浮想联翩,原本的瑞香科植物,在历经了多年的老练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,它不仅有比原木更坚实的心,还永远散放着木质之本芳。就像沉稳若定的心情,谦和静卧在水底,无非与世,自润于水。它最感人之处,就是它的“沉”,有着沉静内敛的品质。更也在它的“香”,一经成就,永不散失。似乎在告诉人们,面对浮华尘世,要保持着深沉的、永远不变的宁静和芳香。

浮世似油水,俗木则随欲望波水流荡,无所定止。沉香是定石,即使在水中也一样沉静,一样的贞香。一个人如果内心有了“沉香”,便能静若参禅,不随俗世,信步游田了。

妻病了送医院,洁白的病房只有酒精味儿和轻微的咳嗽,我怕妻寂寞,在路上买了一串白兰花,卖花的小姑娘贴在街壁站着,看来是刚上手的游摊,“姑娘,你要吆喝吆喝,不然是卖不掉的。”“爷叔,怎样吆喝?”我引喉一叫“梔子花,白兰花!”这是我童年时代在巷尾听到的叫卖声,当时唧呀开门出来众多妇女,你一串,我一串,有的挂在斜襟上,有的插在发髻上,仿佛都像早春二月的上官云珠……

花香引来了护士长,“你是病人的家属吧,花别买来,有些病人是过敏体质,闻不得花香!”不是还有人送来鲜花?“都在外面过道放上放着哩!”那天又路过花摊,我就掉头走去,那卖花姑娘追着:“爷叔,白兰花要哦?”我暗暗笑着:“她终于会吆喝了!”

梔子花,白兰花

周志俊

兵队到处追捕爱国人士,柯灵两次被捕,《万象》也只能停刊了。

我同开垒来往较多,还不仅是开垒在开垒大学上学,同我就读的复旦大学相近,而是他为人坦诚,处事认真,所以时常相聚见面,说话也没有拘束。抗战胜利后,开垒和我常在柯灵主编的一些副刊写稿,特别是《文汇报》的副刊《世纪风》。那时圣约翰大学的一些学生创办了刊物《时代学生》,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地下老党员的丁景唐同志介绍我和开垒去帮忙,当然忙是帮不了多少,但也认识了不少进步朋友。几个月后,我离开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参加工作,有三年没有见面。开垒和其他几个朋友如晓歌、何为、沈寂、袁鹰、沈毓刚等后来都成了作家,我没有当成,但是柯灵和包括开垒在内的几位朋友对我遣词造句能力的帮助,使我终身受用。

1949年4月上海解放,开垒知道我到了上海就来看我,多年未见相谈很欢。我已记不起他当时做什么工作,但仍主要是以写作为业。我劝他去考当时创办的新闻专科学校,这所学校主要是吸收一批青年知识分子,在政治和业务上进行一定时间的培训后,再分配到报社和通讯社工作。他不久就写信告我已考进了这个学校。他在学校里没有一点作家的架子,认真学习。后来,柯灵担任《文汇报》副刊《笔会》的主编,就把他从学校调去当了助手。柯灵多次对我说,开垒工作认真仔细,为人诚恳厚道,是完全可以放心的。柯灵公务繁忙,编辑的具体事务实际上都由开垒来办,最终开垒接替他担任了副刊的主编。当时,

我已到国外担任常驻记者,他多次来信约我写稿,但我在国外工作和事务很多,而且总社对记者对外投稿也有一定的限制。我一直到现在都很后悔没有把真正原因告诉他,漫应之“可以”,但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写。以后,我到国外使馆当了大使,当然更不可能了。但是,我们之间友谊常在,常有书信来往,我每次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本著作特别是《巴金传》时,我常有不少惭愧的感觉,感到我在写作方面比



不知道当下中小学中流行的低龄化写作热,是否跟张爱玲的那句“出名要趁早”有什么关联?

但确实应该承认,很多人未必读过多少张爱玲的作品,但她的这句一不小心“聊发青春狂”说出的话,半个多世纪了却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。但很少有人深思:名人说的每句话是否都值得效仿?更少有人深思:隐含在这句话背后的文学创作价值以及所带来的负面效应。

一位友人的孩子小学还没毕业就开始出书了,父母自然为孩子很早就显露出写作才能而自豪。当下中学生中10多岁就发表作品、出作品集、乃至写长篇小说,几乎也成一个普遍现象。作家韩少功在江苏一个文学论坛上谈到一件事:一位中学生拿着U盘,找到他,说:“韩叔叔,请你看我写的小说,帮我指点指点。”“韩叔叔”打开U盘一看,好厉害,里面一共存了她新写的7部长篇。这位著名作家“韩叔叔”自出道数十年,大概也还未创作出这么多部长篇吧?这些长篇都写什么呢?题材无非是悬疑、玄幻、穿越之类,有的显然脱胎于动漫游戏。是不是因为技术发展,书写的便捷,文学创作的难度就大大降低了呢?肯定不是。大家有目共睹,当下网上虽有海量的写作者,写出的各类体裁作品也以海量计,但真正为广大读者认同和专家赞赏的精品力作又有几部(篇)?

不必要为低龄化写作而忧虑。如果孩子早熟、聪慧又热爱文学写作,是再好不过的事。我所忧虑的是,在家长急功近利或社会不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

他差得多了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们可以向报刊投稿写回忆录了,我向他主编的《笔会》和沈毓刚主编的《新民晚报》副刊《夜光杯》投了不少稿,他们两位常来电话信件给我鼓励,但我也深知,我的笔力已很生疏,比他们大大落后了。以后,我到上海,就去看他,再一起去看柯灵和国容师母,他们到北京开会,也一定到我家来看我。柯灵常说,我们已老了。开垒先在电话中劝我多多写作,他说,我只要有气力,还是要写下去,直到一点写不动为止。现在,他也走了,我相信,他的话,他的精神,将是我们年轻一代特别是文艺和新闻工作者学习的榜样。

我叫陆婉郎,生于1911年,家住崇明岛的营房村。别看我100岁了,头发没有全白,平时我就喜欢用一个黑色的发箍把头发梳到脑后。年轻的时候我裹过小脚,虽然脚小,但是走起路来还是很稳健的。

和岛上许多老人一样,我年轻时是个极好的劳动力,工作很勤快,干起农活来一丝不苟,80岁的时候我还下地插秧,并且一排一排插得跟人家解放军站队那么整齐,比现在的播撒机还好。

年纪大了,子女担心我的身体,就“勒令”我不准下地,从那以后,我有了新的牵挂——掌灯。

我素来喜串门,不管与人认识与否,都会亲切地招呼对方。我家老屋位置比较特殊,正好坐落在村口,紧挨村里连到陈海公路的村间要道,这让我每天都能和任何一个进出村庄的人说上两句话。十几年前,村口按了路灯。每到黄昏时分,我就出门去开路灯。家里人都觉得我是小脚,怕我摔跤,其实我健壮得很呢,我出去走两步,把灯开了,就能让晚回家的人看清脚下的路。多好!

下,将青少年文学创作引向歧途:诸如看到几个80后作家登上“作家富豪榜”,就以为靠文学创作也可以挣大钱,为达此目的而不惜拔苗助长;再如,错误地以为小小年纪,写出几篇不错的文章,就意味着该小孩是“文学神童”,年龄这么小就小荷露出尖尖角,发展下去即便成不了“鲁迅、张爱玲”,也一定是名家、大家等等。

其实,从一部文学史看,一位作家的文学成就跟他起步时的年龄大小没有必然关系。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精神活动,跟每个人的天赋、精神气质、心理、经验积累等都密切相关。别人的成功未必能成为自己仿效的对象。有的人从小“暴得大名”,很快便江郎才尽,再也写不出好东西,终其一生成就并不高;也有的人厚积“后发”,大器晚成,反而成为一代大家。远一点说,季羡林、张中行先生那些精彩的随笔散文大多写于晚年;近一点说,2011年有两部受到读者、学界好评的文学图书,一是台湾作家齐邦媛的《巨流河》,一是大陆作家资中筠先生的《资中筠自选集》,两位先生现都至耄耋之年,她们的文字我个人认为是真正可以流传下去的珍品。有些著作等身、名头比她们大得多的作家也未必可与之等量齐观。

“出名未必必要趁早”。要让低龄写作者懂得,文学创作是一种非常艰苦、寂寞的精神劳动。如果真正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,除了应有文学天赋,还得撇开那些过于浮躁的功利目的,真正从心灵出发,从生活出发,经过长期修炼、磨炼、积累,才能有望创作出文学的精品、“神品”来。

陈漱耕



春放

(中国画)

任耀义

前两年,政府推进“全民健身”项目,在村口的一块空地辟了一个健身角,搬来好几台牵引器械、漫步机等。健身角正好在村口的路灯下,于是每到傍晚,昏黄的灯光下,村里的老年人纷纷出来锻炼。我觉得我“掌灯”工作又多了一层使命。人来得多了,不开灯,容易摔跤。晚上没什么事儿,我就喜欢站在路灯下,看大伙在灯下高高兴兴地锻炼身体,我真高兴!

现在我是家里的“长辈”,但是我早就承担养家糊口的担子了,家里五代同堂,小辈都出去打工了,家里不愁吃、不愁穿,我的任务就是给大家送来欢笑,所以啊,我才是家里的“老小孩”呢。

我还有好几个“绝活”呢,“夏天用冷水擦身”、“不吃药片不生病”,最厉害的是,我至今还能高抬腿。我随便踢一下就能踢到90度呢,厉害吧?问我为啥能长寿啊?我觉得一是因为勤劳带来了一副好身板,二是因为乐观,万事不计较。(唐闻佳整理)

雷锋同志离开我们快50年了,明起刊登一组《在学雷锋的日子里》。

十日谈

臧润寿星话养生

就爱“管闲事”

陆婉郎